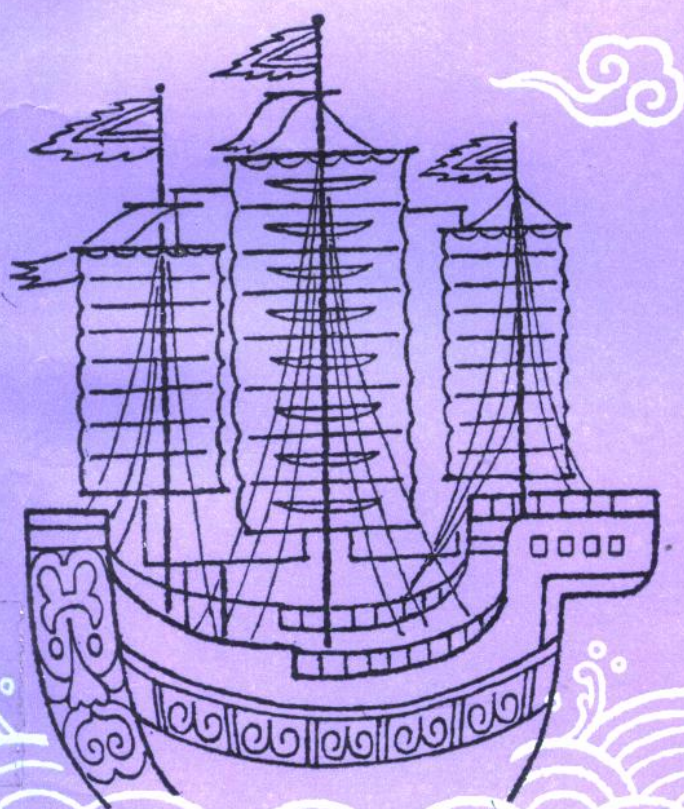


中外关系史论丛

ZHONGWAI GUANXISHI LUNCONG



第 3 辑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本辑编委：韩振华 谢方 张 鎔

责任编辑：杨振武

封面设计：罗雪村

2080/22

中外关系史论丛

第三辑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8 字数：203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5012-0358-x/K·67 定价：3.35元

目 录

唐代的文化开放政策及其对日本奈良文化的

影响.....	王金林	1
元代的对外政策与中外文化交流.....	黄时鉴	27
论明永乐时期的“海外开放”.....	孙光圻	50
论明代前期中国与南洋外交的演变.....	翁惠明	71
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	陈尚胜	105
论明代海禁政策的确立及其演变.....	晁中辰	126
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及其历史教训.....	徐明德	144
明代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影响.....	李金明	170
试论清代并非闭关锁国.....	郭蕴静	182
清代前期中俄边境贸易关系及其对北方民族 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卢明辉	196

古代阿拉伯人记中国..... 龚方震 212

汉代有罗马人迁来河西吗——骊轩县的起源

问题.....	莫任南	231
俄罗斯馆医生与清朝宗室的晋接.....	蔡鸿生	239
中国学在印度.....	[印]雷 易	243

编后记250

唐代的文化开放政策及其对 日本奈良文化的影响

王 金 林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唐代是中国封建文化高度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唐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固然与唐王朝的“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1〕}的国内政策有密切关系，但是，唐代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唐王朝在积极的对外交往中，不断地吸取欧、亚各国文化的精萃，使之与传统的汉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独具中国特色的唐文化的产生，不仅标志着汉文化的成熟和具有世界的先进性，而且还标志着以唐代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唐文化圈的形成。它促进了东亚各国文化的发展，对新罗、日本、越南等国封建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促进地区性的和平和繁荣，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试图从唐王朝的对外开外政策所带来的本国文化的繁荣，以及对东方岛国日本的奈良文化的影响，作一肤浅的探索，疏漏之处，敬请指正。

唐朝的对外政策

盛唐之时，中国的领域远达中亚，周邻国家多达数十个。在这些邻国中，论其国土，有大有小，大者如阿拉伯帝国(大食)，

地跨欧、亚、非三洲。小者如尼泊尔等国，领土有如唐代州郡。论文化，也是参差不一。经济实力也是有的富裕，有的贫弱。面对这样一个友邻世界，唐王朝并没有恃强凌弱，亲富疏贫，而是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

当时，唐王朝的基本国策是：“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2〕}唐王朝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时，除非不得已外，是不轻易动用武力的。比如，对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之争，唐高祖、太宗一直采取平等相待的态度，劝其和平相处。只是调解不成时，才派兵干涉，目的在于扶弱抑强，争取地区性的和平。唐王朝虽然常以天朝自居，把友邻和朝贡之国视为臣属之国，但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却常常采取宽宥的态度。如林邑国曾于贞观四年（630），遣使来唐通好，据说在给唐皇帝的表疏中，有用词失礼之处，朝廷中有人奏请唐太宗以此为由发兵征伐。但唐太宗表示反对。他说：“言语之间，何足介意！”为表疏上的用词失礼而发兵，一劳百姓，二损士兵，是得不偿失的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3〕}。表示了宽厚的度量。唐王朝对各国风俗习惯，均注意尊重，决不以自己的习俗强加于人。如唐开元初，大食（即阿拉伯帝国）遣使到长安，谒见玄宗时，使者不行跪拜之礼，却“平立不拜”。唐礼宾官吏认为大食使者违反唐廷礼仪，应予置罪。中书令张说表示反对，上奏玄宗皇帝说：“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唐玄宗特别敕准，不予置罪。^{〔4〕}据载，大食使者自己说：“在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5〕}据阿拉伯方面的材料记载，此次使团共有六人，在谒见中国皇帝时，第一次穿华丽的服饰，皇帝不见。第二次改穿黑袍，皇帝又不见。第三次全体成员全副武装前往觐见，皇帝才接见了他们。会见时，中国皇帝问他们为何屡改服饰？他们回答说，第一次穿的是见贵妇的服饰，第二次穿的是上朝的服装，第三次穿的是与仇人见面的服装。对此，中国皇帝并不生气，依然赐以厚礼^{〔6〕}。对于大食使节违反唐

朝惯例的行为，如果唐玄宗没有一点开明精神，是极难宽容的。英国学者M·布隆荷尔在《清真教》一书中评价说：“当时处理此事的开明精神，实胜于一千一百年以后之王朝”〔7〕。我认为这一评价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唐代的皇帝和大臣，虽然身居长安，但大多对世界各国的情况，也是了解颇多的。为了接待外国宾客，朝廷专门设置鸿胪寺管理其事。朝廷通过鸿胪寺，既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又加深了对世界的了解。曾主管过鸿胪寺的王忠嗣和贾耽，从来访的使节中，访问异国民情，编著了《西域图》、《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著作。公元851年，由阿拉伯商人写成的一本中国游记中，记述了一个名叫伟伯的阿拉伯人，曾受到过中国皇帝的接见，双方进行了十分融洽的谈话。从书中记述，可知唐代皇帝（可能是唐宣宗）对当时世界各国的情况是很了解的。如皇帝问伟伯：你们国家的人，对其他国家的国王有何评价？伟伯回答不知道。中国皇帝便告诉他：我们只尊重五个国家的王，一是伊拉克王，二是我们中国的皇帝，三是突厥王，四是印度王，五是希腊王。皇帝说：此五王是当时世界上最显赫者，其他国家的王是不足比拟的〔8〕。唐皇帝把中国、阿拉伯、突厥、印度、希腊列为世界五强，与当时的世界形势是基本相符的。如果不了解世界的现状，是难以作出这种结论的。

唐王朝与世界七十余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9〕，通过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的“香料之路”，与中亚、南亚、西亚，以至东非、北非、欧洲诸国，频繁交往。当时著名的印度、波斯、阿拉伯（大食）、拜占廷（拂菻）等国，都有使节、商人、僧侣、学者不断前来中国。就在这种广泛的交往中，不但异国的珍禽、怪兽、奇花异草、金银、珠宝、玉石、香料、药物等传入中国，更重要的是各国的文明，也源源传入中国。同时，汉文明也源源传入世界各国。

唐王朝对外来文化，在政策上既有灵活性，又有原则性。前

者表现在对异国文化，包括宗教信仰、风俗等，不是采取简单的排斥和否定，后者则表现在始终把传统的汉文化放在主体地位上。它像一块海绵一样，把那些优秀的，经过扬弃的异国文化，吸收进来，不断地丰富、充实自己。唐王朝在政治方面，一直贯彻以儒学治国的基本方针。在宗教信仰方面，采取了多种宗教并存的政策。其具体表现是西亚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与道教、佛教并存。在唐都长安等地的波斯人集居区，均允许建寺和传教。在长安西北部就有三座祆教寺院（或称波斯胡寺）。8世纪末，因久旱，唐朝廷曾令摩尼师祈雨^{〔10〕}。景教系基督教中的一派，635年传入中国。638年唐太宗便敕准在长安建寺（波斯寺）。唐高宗时，更敕准在全国诸州建波斯寺，745年，唐玄宗将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除上述三教外，据说伊斯兰教也已传入中国^{〔11〕}。这样，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有自己的传教士在中国活动。

再就音乐而言，唐以前，封建统治者对外国音乐，特别是小国的音乐，取排斥态度。如东汉时，南亚的掸国（今缅甸境内）人到洛阳表演掸国乐，就遭到过阻挠。有人以“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伎”^{〔12〕}为由，反对掸国人演出。唐代与此相反，骠国（今缅甸）王派其弟舒难陀，率领庞大的歌舞团来访。团中仅乐工就有32人。据《新唐书》记载，歌舞团携带的乐器有22种，金、贝、丝、竹、匏、革、牙、角八音齐全。演出的乐曲有12首，其乐名分别为《佛印》、《讚娑罗花》、《白鸽》、《白鹤游》、《斗羊胜》、《龙首独琴》、《禅定》、《甘蔗王》、《孔雀王》、《野鹅》、《宴乐》、《笙舞》等。骠国歌舞团的演出，轰动了长安。著名诗人白居易、元稹等人，都写了赞美的诗篇，表现了唐代人对外国文艺的巨大热情。唐代人以本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事例，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的。如僧一行编制的《大衍历》，虽然是在研究唐以前历代历法的基础上编成的，但也重点参照了印度的《九执历》。在医药

学方面,也广泛地吸取了印度、阿拉伯、拜占廷等国的医术,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苏敬等人的《新修本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都收有外国的药方和药草。唐中期和末期,甚至有专门收录外国药物的书籍,如《胡本草》、《海药本草》等。这些著作显然参考过希腊、阿拉伯、印度等国的医药名著。如伊斯兰医学家拉齐的《曼苏尔医书》、《医学集成》,印度的《药物名汇》、《药物名汇大全》等^[13]。在宫廷音乐方面,唐代采用十部制,即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十部。除燕乐、清商系汉乐外,其他八部皆是西域和外国音乐,汇合了东亚、南亚、中亚,以至西亚的音乐风格。

唐代的对外开放,还表现在重视人才上。唐太宗曾说过:“为政之要,惟在得人。”^[14]唐王朝不但重视拔擢本国的人才,而对于异族异国的人才也是十分器重的。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新罗的崔致远、大食的李彦升等,都在唐朝仕官。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官至卫尉卿、秘书监、镇南都护,位至正三品。天宝以后,朝中蕃相、蕃将甚多。据《北梦琐言》载,公元847至873年,先后有蕃人毕诚、曹确、罗劭权任相^[15]。唐玄宗时,任命32名蕃人为将。拥有各种技艺的人也都能受到重用,使其专长得以发挥。印度僧侣波颇、慧智、金刚智、善无畏、释不空,婆罗门人李天谄,新罗僧元晓等,为唐代佛教经典的翻译都作出过贡献。印度人迦叶孝威、鸠摩罗、瞿昙罗、瞿昙悉达、瞿昙谟、瞿昙谦等先后被聘,在司天台工作,贡献甚多。尤其是瞿昙氏,在司天台任司天监,达100多年。瞿昙罗编有《经纬历》、《光宅历》,瞿昙悉达编有《开元占经》,并翻译了印度的《九执历》。瞿昙谦著有《大唐甲子元辰历》。康国的画家康萨陁,米国的歌唱家米嘉荣,曹国的琵琶名手曹保、曹善方、曹纲等,在长安都是名噪一时的艺术家。不拘国籍,欢迎和重用人才的做法,在唐代以前虽然有,但都没有唐朝这么开放。世界历史表明,善于吸收他民族

优秀文化的民族，其本身的文化必然是鲜艳多采的，而且具有先进性。唐文化就具有这一特色。

东亚唐文化圈的形成及其意义

既融汇了各少数民族文化精萃，又广泛吸收异国文化精萃的唐文化，在7世纪初至10世纪初，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之一。

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唐帝国，很快实现了唐太宗提出的“四夷自服”的目标。长安成为世界性的城市。每天聚集着数以千计的不同肤色和服饰的外国人。唐文化通过各国的使节、商人、僧侣、学者、留学生，被传播到欧、亚各地，而影响最深的则是东亚地区，形成了以唐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日本著名学者西岛定生认为，东亚唐文化圈有五个特点：（一）地域包括东亚诸国，即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二）文化圈内诸国，都使用汉字；（三）都建立了中央集团的政治机构；（四）都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五）都信奉佛教，而且具有“国家佛教”的特性^[16]。

关于唐文化圈问题，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它的形成是由于构成国家的主要民族，采用军事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种种形式，对领域外的他民族国家，建立一种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表现在五个方面，即（1）使被唐占领的周边地区内地化；（2）对周边民族采取羁縻政策；（3）对周边诸国首长实行册封；（4）周边诸国对唐进行朝贡；（5）律令制度的普遍建立^[17]。这种五要素说，过于强调了唐王朝的单向作用，而忽略了文化交流的双向作用。我认为用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高压手段确立的君臣关系，和地区的文化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宗主国与臣属国的国家关系，宗主国可以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臣属国。在这情况下的文化交流，是单向的。相反，地区文化圈中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是用强制手段进行的，而是以平等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

说是双向的。我认为，文化圈的概念应该是：某一地区的诸国家中，某一个先进的文化国，以其特有的文化吸引着周边国家。这里既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国主动向后进的周边国家传播文化，又有落后的周边国对先进文化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的产生，不是由于军事的、政治的高压手段，而是由于彼此之间的文化上的明显差距。唐王朝的强大和文化上的隆盛，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周边各国的统治者和人民，他们为缩短与唐王朝文化上的差距，不遗余力地把唐文化引入本国，并结合本国的特点，有选择地加以消化和吸收。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上的差距所造成的对先进文化的追求欲，是唐文化圈存在的主要原因。因此，我认为东亚唐文化圈存在的具体表现，应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由于唐王朝的强盛，唐与周边国家之间，在政治、军事上形成了自然的联盟关系，维系这种联盟的，就是以唐为核心的册封制度和朝贡制度；第二、周边各国模仿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引进唐的文物制度，实行有利于本国社会发展的改革。上述两种表现是从总体上而言的，倘若具体到某一国，就会有各不相同的差异，如册封和朝贡，国与国就不一样，日本等国有朝贡关系，而无册封关系，新罗等国，既有朝贡，又有册封。模仿唐朝，吸收唐文物制度，实行改革的程度，各周边国家间也是不尽相同的。从现存的史籍记载可知，周边国家中，模仿唐朝最积极而又有显著成效的，是东北亚的新罗和日本。

新罗时代的朝鲜文化和奈良时代的日本文化，与唐代文化有许多近似之处。如在政治上，都实行以皇帝（或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建立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在经济制度上，都推行按丁授田制度，唐代称均田制，日本称班田制，新罗称丁田制。在赋税制度方面，三国都实行租庸调制。在文化领域，唐、日本、新罗之间，相似之处更多，除三国都兴佛教外，其他在文学、书法、音乐、绘画、歌舞、建筑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唐文化的因子。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似，并不是简

单的模拟,而是以各自的民族文化为土壤,经过消融而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所包含的国际性和民族性,把东亚诸国,特别是东北亚诸国,迅速推上了世界先进国之列。

日本是获益最深的国家。当中国社会已发展到封建社会阶段的时候,日本刚刚开始步入文明时代。但是,到了7、8世纪,日本却已抛掉了落后的帽子,骤然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唐王朝的文明国。如此迅速的进程,当然是长期消融外来文化的结果,但不能否认唐文化圈的形成这个关键因素。高度发展的唐文化,为日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成模式,以及实现这一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因而大大缩短了日本历史发展的进程。

正是由于东亚各国都倾注精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和文化,巩固各自内部的集权统治,使东亚地区出现了和平、睦邻和共同繁荣的新局面。我认为,这就是唐文化圈形成的意义之所在。

唐朝的开放政策及日本奈良王朝的对策

日本奈良时代,也是一个极少保守的开放时代。公元663年8月,日本插手朝鲜半岛的纷争,在白江口与唐朝水军相战失败,引起朝野反省。统治者们认识到唐的强盛与自己的落后。一种以唐为榜样,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欲望,无形地鞭策着上自天皇、大臣,下至奋发有为的青年学者和僧侣。710年,迁都平城京(即奈良)以后,这种欲望变成了行动。奈良王朝推行了一系列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内外政策。国内政策的重点放在重视农耕、奖励文化发展上,明确指出:“食之为本,是民所天,随时设策,治国要政”。^[18]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天皇诏敕宣布:“文人武士,国家所重,医卜方术,古今斯崇”,“优游学业,堪为师范者,特加赏赐,劝励后生”。^[19]奈良王朝的对外政策是在对等的前提下,加强与唐王朝的亲善关系,全面地移植唐代文化。

唐代的开放政策,与日本奈良王朝推行的对外政策,是不矛

盾的。唐代的开放政策，为日本提供了如下有利条件：（1）唐王朝视日本为“礼仪之国”，“君子之国”，日本使节颇受重视。因此，日本可以派遣庞大的使团和留学生，到唐朝考察、研究、移植唐文化；（2）唐王朝的兴盛，吸引着世界各国，来自欧、亚、非的使节、商人、学者云集长安，为日本提供了接触世界、了解世界的机会，使日本摆脱了海岛孤居的局面，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3）日本通过派遣的使节、僧侣和学生，不但广泛接触了唐、印度、波斯等国的学者、高僧，而且竭力劝诱他们东渡日本。终唐一代，日本在唐招募了一批具有较高学识的人才。

综观日本历史，奈良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之一。究其原因，就是得益于唐文化的移植。在移植唐文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朝廷派遣的遣唐使团和留学生、学问僧。根据日本史书记载，日本共派遣过13次正式使节。初期使团规模较小，每次两艘船，每次250人左右。中、后期规模渐大，每次4艘船，人数500人左右。由于当时航海技术比较落后，所以使团人数中，大约一半以上的人是保证船只安全航行的水手。因此，衔命赴唐从事国务和文化考察的人数，约占人数的一半。13次使团，合计总人数约5,000余人，而负有使命的约2,000至2,500人。这2,000至2,500人，上自使团领导的大使、副使、判官、录事，下至一般团员，多是身有技艺的专门人才。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是当时日本国内最通晓经文、擅长文墨和了解唐朝情况的人。使团成员，有知乘船事、造船都匠、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音乐长、卜部、杂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等〔20〕。可以说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的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等方面的优秀人才。这些人到了唐朝，如鱼得水，在极有限的时间内，深入各自的领域学习、考察。他们大多带着专题（即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而来的。如随团医师菅原棼成，赴唐目的就在于探索医术。“承和元年，从聘唐使渡海，朝廷以棼成明达医经，令其请问疑义。”〔21〕

因此可以说，终唐一代，日本派遣了2,000到2,500名具有一定专门技艺的学者，到唐朝进行了一年左右的文化考察和研究。事实表明，这种短期的学者考察、访问，其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既解决了疑难，接触了新的知识，又带回了大批文物、书籍。如开元五年（日本养老元年），日本大使多治比县守一到达长安，便要求向诸儒学习经史。唐玄宗派四门助教赵玄默到鸿胪寺专门给他授课。完成使命回国的时候，还将“所得赐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22〕。

奈良政府派遣的留唐学生和学问僧，大多是随遣唐使前来中国的。初期和中期，留学生和学问僧在唐滞留时间较长，很多人长达20年或30年。后期留学时间大大缩短，一般是1、2年，最长也不超过5年。时间的长短，反映了对吸收唐文化的迫切程度。前、中期需要对唐文化全面考察和学习，时间自然要长些。到后期，因为经过前、中期的大量输入，唐文化的精萃大多获得了解和掌握，无需再花长时间去考察学习，只是在消化过程中产生的疑难尚需进一步解决。因此，带着疑难专题而往，疑难解决即可回航，时间就相对缩短了。每次随遣唐使赴唐的留学生、学问僧，人数一般是10数人，最多不会超过20、30人。据学者研究，日本随遣唐使派过12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因此，终唐一代，大约派过200至300名青年学生、僧侣赴唐留学〔23〕。据查，在中、日史册留名的学生、僧侣共116人。在这116名青年人中，留学生仅26名，学问僧却有90名。关于派遣留学生与学问僧比数悬殊问题，我国学者胡锡年先生有过专文研究。他认为，派遣学问僧多而留学生少的原因，主要在于留学生来唐，入学于国子监，而国子监收纳学生，门第、名额有限制，故不能多派；相反僧侣则不受限制；日本笃信佛教，也是多派学问僧的原因之一；另外，日本朝廷大权为世家大族所垄断，世家大族不希望派遣大批留学生，以免日后形成与自己对立的政治集团，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24〕。

留唐学生和学问僧，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日本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极大的。留唐学生和学问僧的功绩主要有三：

第一、他们在唐期间所学的学问和知识，回国后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期的留唐学生和学问僧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旻等人（他们是隋朝时来中国的），在中国期间，正经历了唐朝中央集权体制逐渐完备的过程，回国后致力于日本国内的政治改革。著名的日本大化改新中的两位核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在实行政变前，曾多次请教留学归国的南渊请安。据日本史籍载，他们两人“俱手把黄卷，自学周孔之教于南渊先生所。遂於路上往还之间，并肩潜图，无不相协”〔25〕。这里所说的“学周孔之教”，从后来大化改新中所实施的各项政策看，显然包含着唐代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经验方面的知识。大化改新后，留唐回国的高向玄理、僧旻被任命为国博士〔26〕，参照唐朝制度制定各项制度，如校田亩、造户籍；设钟匱，广开言路；宣布废除贵族豪强私有土地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公田公民制；仿唐均田制，实行班田制和租庸调制；整顿官僚机构，推行阶品制，设置八省百官等。大化政府的一系列新政策、新制度的建立，高向玄理，僧旻等人都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奈良王朝删定的律令，也有留唐学生的功绩。留学生大和长冈，在唐期间曾专心攻读刑律。回国后，与另一位留唐学生吉备真备一起，曾于791年“删定律令廿四条，辨轻重之舛错，矫首尾之差违”〔27〕。膳大丘随遣唐使入长安，在国子监攻读，“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28〕，学习甚为刻苦。回国后，上奏天皇，要求“大崇儒范”，赐孔子为文宣王，得到了称德女皇的敕准，对于奈良时代儒学的传入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吉备真备在唐28年，入国子监“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众艺”，播名于唐都长安。归国后对日本的政治、军事、文化均有出色的贡献。他任大学助时，正是日本“大学释奠，其仪未备”之时，他便参照唐制，“依稽礼典，器物始修，礼容可观”〔29〕。他还充实、完备大学寮的课程和内容，开设了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课程。他在担任大宰府大式职时，正适唐朝发生“安史

之乱”，为防备唐朝内乱波及日本，他曾受天皇之命“预设奇谋，纵使不来，储备无悔”〔30〕。但由于当时日本盛平已久，九州防备松散，防人不习战阵。吉备真备建议采取临时措施说：“且耕且战，古人称善，乞五十日教习而十日役于筑城。”〔31〕760年，他受朝廷之命，给六名朝廷武官教习“诸葛亮八阵，孙子九地及结营向背”〔32〕。入唐留学的学生，除吉备真备官至大纳言外，大多屈居中、下级官吏，虽然未居高位，但在自己的任职岗位上，为移植唐代文化却是不遗余力的。

第二、他们搜集和输入汉文书籍和文物，极大地丰富了奈良文化的宝库。由于史籍记载的局限，我们虽然不能确切地找到每一个留学生和学问僧带回的汉文书籍，但仅从有限的记载，就可知其输入量的可观了。735年吉备真备回国后呈献给朝廷的物品是：

《唐礼》一百三十卷，《太衍历经》一卷、

《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

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

《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

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

一张、射箭廿隻、平射箭十隻。〔33〕

其中的《唐礼》，对奈良朝的朝廷礼仪有不少影响。《太衍历经》对日后废仪风历，以太衍历为日本通用历法关系甚密。乐书、乐器的传入对奈良朝盛行唐乐也不无关系。奈良时代，见之于史籍携回大量书籍的另一位年轻人，是学问僧玄昉。据载：

“天平七年（玄昉）随大使多治比真人广成还归。赉经论五千余卷及诸佛像来。”〔34〕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玄昉携回的五千余卷经论是唐开元本《大藏经》。因为据《开元释教录》载，《大藏经》总一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日本《正仓院文书》也有“合依开元目录应写一切经五千四十八卷”的记载。上述两书的五千四十八卷，正与玄昉的五千余卷相近〔35〕。平安时代，入唐的空海、最澄等八位僧侣，史称入唐八大家，携回的经论为

一七〇六部，三二二四卷，数量可谓不小，但也没有超过玄昉携回的卷数。因此不难看出玄昉对奈良佛教的兴盛，以及佛典的传布所做的重要贡献。随着汉译佛典以及中国僧侣的著述、注疏本的传入，奈良时代盛行佛经抄写事业，国家建立写经司，下设写经所。寺院也都设有写经所。据统计，奈良时代抄写的汉译印度佛典约一一九三部，四八八四卷，中国僧侣的佛教著述六三六部，四二一八卷，总计一八二九部，九一〇二卷^[36]。

大量汉文书籍的传入，既使日本的社会变革有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又极大地丰富、充实了奈良朝廷的藏书。随着汉籍的大量传入以及抄写事业的发展，日本地方政府和贵族私人的藏书也日渐充实。比如地处北部九州的大宰府，是对唐交流中心之地，当时在日本堪称“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当地收藏的汉籍图书虽多，但也有短缺。大宰府769年曾上书朝廷，要求对其所缺中国正史予以补充，呈文说：“此府……子弟之徒，学者稍众，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37]应其要求，朝廷特赐给《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891年，日本曾仿《隋书·经籍志》编纂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在编纂此目录的16年前，即875年，收藏许多珍贵图书的冷泉院曾因失火，损失甚大。尽管此书目录是根据失火后的藏书编纂的，但存书量仍然相当可观，计有易（177卷）、尚书（113卷）、诗（166卷）、礼（1909卷）、乐（207卷）、春秋（371卷）、孝经（45卷）、论语（269卷）、说异（85卷）、正史（1372卷）、古史（240卷）、小学（598卷）、杂史（616卷）、霸史（122卷）、职官（70卷）、仪注（95卷）、起居注（39卷）、旧事（20卷）、杂传（306卷）、刑法（110卷）、土地（341卷）、簿录（22卷）、谱系（16卷）、儒家（134卷）、法家（38卷）、道家（458卷）、名家（4卷）、纵横家（3卷）、墨家（3卷）、杂家（2617卷）、农（13卷）、小说（48卷）、兵（227卷）、天

文（461卷）、历数（167卷）、五行（919卷）、楚辞（32卷）、别集（1568卷）、总集（1568卷），合计四十家，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其中大部分是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传入的。

第三、劝诱、招聘一批唐、印度、西域学者、高僧渡日，为奈良时代的文化界增添了新的血液。奈良时代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入唐的目的之一，就是物色异国的优秀人才。733年入唐的学问僧荣睿、普照，在出发前，朝廷交给二项任务：学习佛法和招请唐朝高僧。荣睿、普照在唐十余载，学法聘师，十分活跃。在他们的聘请下，洛阳大福光寺道睿律师先期赴日，后来他们又聘请长安安国寺僧道杭、澄观、洛阳僧德清、高丽僧如海，途经扬州回国。到了扬州，又专门到大明寺盛情邀请鉴真大和尚东渡。〔38〕

据史籍记载，奈良时代东渡日本的唐人，多达四、五十人。比较有名的有鉴真、道明、道荣、道睿、法进、思讷、袁晋卿、皇甫东朝、沈惟岳等人。由唐东渡日本的印度人、西域人有六、七人，主要有胡国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腾波国人善聪、婆罗门僧菩提、波斯人李密医、婆罗门僧佛彻、新罗僧审祥。这些异国的学者、高僧，虽然人数不多，但对于推动奈良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高僧鉴真及其弟子，不但在日本开创了律宗，使日本佛教纳入了具有正规戒律的规范，而且在建筑、医学、雕塑、书法、文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鉴真曾被任命为大僧都，其弟子如宝被任命为少僧都。高僧道睿抵日后，不但传播律宗，而且还对日本华严、天台两宗的发展起过作用。僧侣道荣成为佛经唱诵发音方面的权威。奈良朝廷曾规定，转经唱礼，不许“妄作别音”，“宜依汉沙门道荣、学问僧胜晓等转经唱礼，余音并停之”。〔39〕唐人袁晋卿精通《文选》、《尔雅》的音韵，在日本任大学音博士，官至大学头、安房守等职。唐人皇甫东朝、皇甫升女擅长唐乐，他们的演奏颇得好评。东朝曾任日本朝